

D068
F-75

Michel
Foucault

必须保卫社会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米歇尔·福柯 著

钱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必须保卫社会/(法)福柯著;钱瀚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ISBN 7-208-03260-2

I. 必… II. ①福… ②钱… III. 战争与和平问题—理论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951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6 ·

必须保卫社会

米歇尔·福柯 著

钱瀚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2,000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100

ISBN 7-208-03260-2/D·587

定价 15.70 元

前 言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记录的出版工作由本书开始。

从1971年1月至1984年6月辞世,除了休假的1977年,米歇尔·福柯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教席的名称是:思想体系史。

1969年11月30日,于勒·于伊曼(Jules Vuillemin)提议,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通过,以此教席替代去世的让·伊玻利特(Jean Hippolyte)教授的哲学思想史教席。1970年4月12日,这同一个委员会推选米歇尔·福柯为这个新教席的教授。¹当时他43岁。

1970年12月2日,米歇尔·福柯开讲第一门课。²

法兰西学院的教学要遵守一些特别规定。每位教授每年至少教授26个小时(最多可以有一半课时是讨论课³),他们每年

1. 米歇尔·福柯按照候选程序提交了一本小册子《应当进行思想体系史的研究》,《职衔与业绩》,载于《言与文》,1954—1988, D. 德福尔(D. Defert)与 F. 艾华德(F. Ewald)编,合作者 J. 拉格朗吉(J. Lagrang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4,第1卷,846页)。

2. 1971年3月,由伽利玛出版社以《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作为书名出版。

3. 米歇尔·福柯的讨论课一直开到80年代初。

都必须讲述独创性的研究，每次都要更新讲课内容。听课和参加研讨课都是完全自由的，既无需注册，也无需文凭，教授们也不能发文凭。⁴人们常说，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没有学生，只有听众。

福柯在每年1月初至3月底的星期三上课。听者甚众，包括大学生、教师、研究生、好奇的人，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一共占据了学院的两个阶梯教室。福柯常常抱怨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太大，而且课堂的形式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少。⁵他向往研讨课，一种真正合作工作的场合，并为此做过多种尝试。最后几年里，讲课结束后，他用很多时间来回答听众的提问。

1975年，《新观察家》记者热拉尔·帕迪让(Gérard Petit-jean)是这样描述课堂上的气氛的：“福柯健步走进教室，好像某个人一头扎进水里，他穿越人群坐到讲台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麦克风，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钟也不耽搁，扩音器里就传出响亮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化工具，大厅里昏暗的灯光来自一个仿大理石的浅口盆。大厅有300个座位，但有500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他讲得清晰，言简意赅，没有一点儿即兴演说的迹象。福柯每年只有12个小时在公开课上讲解他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尽可能讲得精练一些，然后再加以补充，就像人们写信时写到最后还意犹未尽。晚上7点15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冲向讲台，不是为了和他说话，而是为了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人提问，拥挤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福柯对此评论道：“应当对我的讲课进行讨论。有时，课讲得并不好，仅仅一个提问就能使它重来，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等到。在法国，团体的效果使一切真正的讨论变得

4. 在法兰西学院的范围内。

5. 在1976年，福柯希望(但是无效)减少听众人数，把上课时间从17点45分改为上午9点。参见本书第一课的开头(1976年1月7日)。

不可能。由于没有反馈的渠道，讲课被戏剧化了。面对人群，我有点像个演员或者小丑。当我一结束讲话，就感到一种完全的孤独……”⁶

米歇尔·福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教学：研究即将完成的著作，开拓问题化的领域，这更像是对未来的研究者发出的邀请。因此，法兰西学院的课上不讲授已出版的著作，虽然讲课和著作有些相同的概念，但它也并非著作的草稿。授课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属于福柯所从事的整体“哲学行动”一部分的话语机制。他主要提出知识/权力关系谱系学的提纲，以此为依据，他从1970年开始反思他的工作——与以前他从事的话语形式的考古学相对立。⁷

授课同时还有一种现实性意义。吸引听课者的不仅仅是每个星期建构起来的叙事；也不仅仅是鲜明有力的展示，而且还有对现实的看法。福柯的艺术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他可以讲述尼采或亚里士多德，19世纪的精神病学鉴定或基督教传教士守则，但听众总是能从中感到映射到现实和同时代事件的思想火花。福柯在课堂上独特的力量在于博学、个人的介入和对现实事件研究之间微妙的呼应。

70年代，磁带录音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变得更加完善，米歇尔·福柯的办公室也开始采用此项技术。授课和一些讨论课的内容得以保存下来。

本次出版工作以米歇尔·福柯的公开授课内容为蓝本。我

6. 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里伟大的布道者》，刊于《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

7. 参见《尼采·谱系学·历史》，《言与文》第2卷，137页。

们尽最大可能逐字记录录音，⁸希望按照讲课的原样出版。但是
从口头到文字的转换要求编者的介入，至少得加上标点符号和
划段落。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与课堂上的讲授保持一致。

然而删除某些重复之处，重新连接上断开的句子，修改一些
不正确的语法结构，这又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省略号表示此处的录音无法辨认，当句子含混不清时，在括
号〔 〕中加入一些连接词和附加成分。

页底的星号表示米歇尔·福柯使用的注和课上讲授的注有
明显不同。

所有的引用都经过核对，所涉及文章的具体参考部分也已指
出。校勘仅仅局限于澄清含混之处，阐明暗示和确定校勘之处。

为了方便阅读，每一课前都有一个由关键词组成的目录，指
出其主旨。

书后附有授课的概要，它曾发表于《法兰西学院年鉴》。米歇
尔·福柯一般在6月，即授课结束一段时间以后进行撰写。对于
他，这是一个追溯式地点明意图和对象的机会。在此，他的表达
最为完美。

每本书结束时都由编者负责指出“情境”，告知读者一些传
记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背景，将本课置于已出版的著作的背
景之中，并指出它在各种样本(corpus)之中的地位，以方便理
解，避免因不知道授课的整体环境而导致的误解。

这次将法兰西学院授课录音的整理出版使米歇尔·福柯工

8. 主要采用吉尔贝尔·布尔莱(Gilbert Burllet)和雅克·拉格朗吉(Jacques La-grange)的录音，现保存于法兰西学院和舒尔史瓦(Saulchoir)图书馆。

作的另一个新方面得以与世人见面。

确切地说,这不是遗作的出版,因为这次出版的是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话,不属于书写的范围,很有研究的价值。米歇尔·福柯笔记的拥有者达尼埃尔·德福尔允许编者查阅了笔记。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法兰西学院授课录音的整理出版获得了米歇尔·福柯继承人的允许,他们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国外,他们苛刻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其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努力不辜负他们给与的信任。

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çois Ewald)

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essandro Fontana)

目 录

前 言

1976年1月7日 (1)

课堂是什么? ——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
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
——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
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1976年1月14日 (22)

战争和权力——哲学和对权力的限制——国王的
权利和权力——法律、统治和奴役——对权力的解析：
方法问题——统治权的理论——惩戒的权力——规则
和规范

1976年1月21日 (38)

统治权理论与统治操作者——作为权力关系分析
器的战争——社会的二元结构——历史—政治话语，
永恒战争的话语——辩证法及其编码——种族斗争话
语及其记录

1976年1月28日 (59)

历史话语和它的拥护者——种族斗争的反历史——罗马历史和《圣经》历史——革命话语——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变迁——种族的纯粹和国家种族主义：纳粹式变形与苏联式变形

1976年2月4日 (77)

对反犹主义的回答——霍布斯那里的战争和统治权——在保王党、议会派和平均主义者那里关于对英国的征服的话语——二元图式和政治历史主义——霍布斯想抹杀的东西

1976年2月11日 (106)

关于起源的叙事——特洛伊神话——法国的继承——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侵略、历史和公法——民族的二元性——君主的知识——布兰维里耶的“法兰西国家”(Etat de la France)——(法院的)书记室、办公室和贵族的知识——历史中的新主体——历史与建构

1976年2月18日 (134)

民族与复数的民族——罗马的征服——罗马人的伟大与衰落——论根据布兰维里耶观点的日耳曼的自由——索瓦松的花瓶——封建的起源——教会、法律、国家的语言——在布兰维里耶那里对战争的三种普泛化：历史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战争制度；力量的计算——关于战争的意见

1976年2月25日 (159)

布兰维里耶和建构历史—政治的连续——历史主义——悲剧和公法——历史的行政中心——启蒙的提问方法和知识谱系——知识纪律化的四种操作及其后果——哲学和科学——成为学科(discipline)的知识

1976年3月3日 (178)

历史知识的策略性普泛化——建构、革命和周期性的历史——原始和野蛮——对野蛮的三种审查——历史话语的策略——方法问题：市民的认识论的场和反历史主义——革命历史话语的复活——封建和哥特罗马

1976年3月10日 (205)

从民族到大革命的观念的政治再分析：希埃斯——理论后果和对历史话语的影响——新历史的可理解性的两个框架：统治和整体化——蒙特罗希耶和奥古斯丁·蒂埃里——辩证法的诞生

1976年3月17日 (226)

从统治权到对于生命的权力——使人生存和放任死亡——从人—肉体向人—类别：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诞生——生命权力的运用领域——人口——关于死亡，特别是弗朗哥的死亡——纪律和规则的讲述：工人区、性、规范——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功能和活动领域——纳粹主义——社会主义

概 要·····	(248)
授课情况简介·····	(254)

1976年1月7日

课堂是什么？——被奴役的知识——斗争、谱系学和科学话语的历史知识——权力、谱系学的赌注——权力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理解——作为镇压和战争的权力——克劳塞维茨格言的反说

我希望弄清楚些这个课堂的性质。你们知道，这个你们所在的、而且我也身在其中的机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机构。自它很久以前成立以来，无论人们给了它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法兰西学院目前主要的职能是研究：人们领取薪水来研究。我认为，教学活动将没有意义，如果人们不给予、赋予教学活动这样的意义，至少我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人们领取薪水来进行研究，那么什么可对它加以控制呢？通过什么方法人们可以了解到谁将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以及谁有进行这项研究的动机呢？人们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不是最终通过教学，也就是说，通过公开演讲或通过某种半制度化的方式使公众了解到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话。因此我认为每个星期三的集会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使公众了解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另外，我也基本上被允许按我自己的想法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事实上有责任告知你们我的工作，它到了什么程度，它的研究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同样

的,我认为你们可以根据我所说的,自由地做你们想做的事。这是一些研究的线索、观点、草图和没有连成线的点和工具: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它们,至少,这使我感兴趣,但与我无关。在不给你们制定使用它们的规则的意义上与我无关;而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它们的使用与我的工作相联系并基于我的工作之上的意义上,我对它感兴趣。

前面已经说过,你们知道前几年课上的情况:因为人满为患(我们尚不知其原因),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点半钟到达〔……〕而我,我和站在面前的听众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有一部分,甚至一半的听众要到另一个大厅里,听我从麦克风里发出的声音。这甚至已不再是表演——因为我们互相无法看到。但它因为另一种原因发生了堵塞。对于我来说(我这么说吧),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怎么说呢……折磨这个词太重,烦恼又太轻。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为了让我能够事实上认真细致地为授课做好准备,我用在本来意义的研究上和用在虽有趣但于我有点不太能够讲述的东西,与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相比少得多:我怎样才能让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装下这样或那样的内容,使它不至于使人太厌烦。总之,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使那些早早就赶来听我讲课的人的良好愿望能够得到一些满足。每年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月,我想,我在这里,也让你们在这里,也就是说进行研究,擦去某些事物上的灰尘,使我们见到它们的本来面目,发明一些观点,从事这一切实际上并不是对已完成的工作的报偿。这些事物大量仍处于悬置之中。因此我对自己说:三十或四十个人聚在一间大厅里并不坏;我可以大致说说我做了些什么,而且同时和你们有一些接触、谈话,回答你们的问题等等,从而产生一些相互交流的可能性,这是与正常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相联系的。

那么,现在怎么做的呢?按照规定,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因此,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我是这么想的,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终究有一个标准。毕竟,这里总是有小麦克风、录音设备,录音将会传播开去,有时以磁带的形式,有时则被打印出来,甚至会出现书店里——因此我对自己说:它总是会流传的。人们就试着〔……〕请原谅我让你们早早起床,也请那些没能来的原谅我;实际上,这是为了使星期三上午的会面与谈话能稍微进入更正常的轨道,这个轨道使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在有规律的制度性的间隔中进行并使其让人了解。

那么,今年我要给你们讲些什么呢?我真有点烦了:也就是说我要试着在某种程度上给一系列研究限定、规定一个终点(事实上人们就是这样使用研究这个词的,它确切地指什么呢),实际上给我到这里以后四五年里做过的事规定一个终点,我很明白,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来说,它集合了一些不当之处。这是一些相互非常邻近的研究,但没有组成一个连续的严密的整体,这些研究是片断的,没有一个达到了终点,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研究是分散的,而且还有很多重复,它们落入同样的常规,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概念。有关于刑罚程序历史的报告;涉及进化和19世纪精神病学制度化的一些章节;关于古希腊的诡辩术或货币,或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一些思考;关于性知识粗略的勾画,或者说是17世纪通过忏悔活动展开的性知识的历史,或者是18和19世纪对儿童的性的控制;对关于畸形的理论和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技术的定位。一切都在踏步,没有进步;一切都在重复而没有相互联系。实际上,它们不断地说着同样的

事,但也有可能什么也没说;它们陷入了难以辨认的杂乱无章之中,没有任何组织;总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什么也没得到。

我可以对你们说:总之,这是一些要继续下去的轨迹,它们通向哪里并不重要,甚至不通向任何地方也不重要,无论怎样,它并不规定必须向前的方向;这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点,应当由你们来继续或转向;而我可能会继续,也可能给它们另外勾画一个轮廓。总之,我们都很清楚能够怎样利用这些片断。我使自己有点像一头跃出水面的抹香鲸,留下一串稍纵即逝的泡沫,让人相信,使人相信,人们也愿意相信,也可能人们自己实际上相信,在水面下,有一条人们不再看得到的抹香鲸,它不再受任何人觉察和监视,在那里,这条抹香鲸走着一条深深的、前后一致和深思熟虑的道路。

这就是大致的情况,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总之,我给你们介绍的工作是片断的、重复的和连贯的,它和人们说的“发烧的倦怠”相一致,这种“倦怠”表现出一种性格上的对图书馆、对档案、对附注、对积满灰尘的手稿、对从来无人过目的文章、对印数极少躺在书架上直至几个世纪以后才有人拿出来书充满爱恋。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忙忙碌碌的惯性是相符的,他们教授一无用处的、奢侈的知识和知识暴发户的财富,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它的外部标志就在书页的底部。这一切与这样一些人是适合的,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西方可能是最古老同时也最有特点的秘密团体中的一个,这些秘密团体奇怪的不可摧毁,不为人知。我认为它们可能在古代和基督教早期形成于最早的修道院中,这些修道院处于侵略、火灾和森林的边缘。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柔软的、温暖的、一无所用的、博学的共济会。

不过,并不是简单的对共济会的兴趣驱使我工作。我感到完

成的这项工作有点经验性的和偶然的从你们传到我，又从我传到你们。人们可以辩护说，它很适应一个非常特定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时期，即过去 10 年、15 年，最多不过 20 年。我想说，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如果不是确实重要的话，至少我也认为相当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所说的非连续的分散攻击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和它们奇特的有效性，例如，分析精神病学制度的功能和非常局部化的反精神病学话语；你们都知道它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体系化的东西作为这些话语的支持，无论它们过去和现在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参照。我想到了根本性的参照系——存在主义分析，¹也想到了目前使用的参照系，大体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莱切(Reich)²的理论中，我同样想到了(应当说)对传统的性道德或传统的性等级进行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攻击，这些攻击同样用一种含混和有相当距离的方式，总之是用一种含混不清的方式以莱切或马尔库塞(Marcuse)³为参照。我还想到了对司法和刑罚系统有效的攻击，其中有些攻击离“阶级正义”这个相当可疑的普遍概念的距离非常远，而另一些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主题的联系也并不更加密切。同时，我还更确切地想到了一些有效的东西(我甚至不敢说到具体的书)，像《反俄狄浦斯》⁴，它实际上除了自己不可思议的理论创造力以外没有任何参照；书，或更可以说是东西，可能会使这样的嘟哝在最日常的活动喊哑了嗓子，这嘟哝声长时间没有间歇地从长沙发走到椅子。

因此，我说：近 10 年或 15 年出现了对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的迅速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甚至也许特别是那些最熟悉的、最坚固的和离我们、离我们的肉体、离我们每天的行动最近的。但同时这种易碎性和

这种不连贯的个别和局部批判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性在这些事实中暴露出一些东西，它们是最初没有预见到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对整体理论，我更想说是对包容和总体理论的抑制作用。这些包容和总体理论并非不再继续提供在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可以确切地证实这一点。但它们在提供这些局部可以利用的工具时有一个先决条件：话语的整体理论被悬置起来，它无论如何也要被切开，左右拉扯，撕得粉碎，改变方向和地点，被漫画化，被游戏，被戏剧化等等。总之，这些主题在理论整体中的复兴会实际上导致刹车。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15年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我相信这并非指迟钝、幼稚或愚蠢的经验主义，更不是指死气沉沉的折衷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被任何理论工作进行渗透，更不是指有些自愿的禁欲主义，使自己尽可能在理论上干瘪。我相信，局部化批判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的第二个特征：我觉得这种局部的批判通过人们所说的“知识的回归”得以实现。通过“知识的回归”，我想说，如果这是真实的：过去的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至少在表面上接触到这样一个整体的主题：“不！不再有知识，只有生活”，“不再有认识，只有真实”，“没有书本，只有钱”ⁱ等等，我觉得在这整个主题下，通过它，甚至在它之中，人们看到产生了可以称之为“屈从的知识”的造反的东西。通过“屈从的知识”，我感到两种东西。一方面，我想总体上指出一些历史内容，这些历史内容曾在功能的一致性或在形式的系统化之中

i. 手稿上，不是“钱”，而是“旅行”。